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中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前的中俄关系史，从19世纪中叶起，主要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给中苏两国关系留下许多悬案。苏俄政府虽曾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但中苏之间悬案的交涉，仍然是中苏早期关系史的突出问题。因此，在叙述中苏早期关系历史之先，有必要简述中俄关系的历史，以便对这些悬案产生的历史有所了解。

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从第一代沙皇伊万四世（1547—1584年）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统治的三百多年中，沙皇俄国不断向周围扩张自己的领土，吞并了众多的土著民族，掠夺了邻国的大片土地，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世界大帝国。中国便是受其侵害的国家之一。

沙皇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从十六世纪后半期起，沙俄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已到达中国的北部边陲并侵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攻城掠地，侵扰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宁。

当时，封建农奴制的沙皇俄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十六世纪末起，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俄国国内出现了一批大商业资本家。到了十七世纪，俄国开始形成统一市场。从此，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正是在这个时期。因此，列宁强调指出，沙俄征服西伯利亚和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一十八世纪欧洲国家争夺殖民地是同一性质的。[①]随之，一批俄国殖民冒险家应运而生。十七世纪中叶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正是这样一批俄国殖民强盗——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他们到处烧杀抢掠，妄图占领这块肥沃的中国领土，只是当时中国正是清王朝初期，国力强盛，中国军民对沙俄殖民强盗的来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才使沙俄的企图未能得逞。最后，沙俄政府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的倡议。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允许把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并给予俄国以通商利益。条约签订后，沙俄从黑龙江地区撤回了侵略军。《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中俄之间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应该说，这期间中俄之间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往对两国都是有益的。但沙皇俄国并未放弃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实际蚕食。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国力衰微，沙皇俄国便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侵吞中国边疆的大片领土。1851年中俄缔结《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是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沙俄通过这一“章程”，取得了片面设领、领事裁判权、免税贸易、设置商站等政治经济特权。1858年至1860年，沙俄又乘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取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以后沙俄又强迫中国签订了《勘分西北界

①见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6页。

约记》（1864年),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西北部大约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

十九世纪末，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包括沙皇俄国，开始进入垄断阶段，沙皇俄国与其它列强一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与争夺。但沙俄除用银行加铁路的经济手段加紧对中国侵略外，同其它西方国家比较，它更多采用军事侵略的手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沙俄策划“三国干涉还辽”，强迫日本吐出中国辽东半岛后，透逼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1898年又攫取了旅大租借权与修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特权。1900年夏，沙俄同其它列强一起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残酷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与此同时，沙俄单独出兵十几万，武装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最后，沙俄又与其它列强一起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攫取了最多的赔款。但由于俄军独占中国东北，引起了同日本尖锐的利益冲突，导致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沙俄失败告终。沙俄被迫将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权益让与日本。这样，俄日两国便划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以后沙俄又乘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划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夺取了外蒙古。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俄国的革命者就严厉谴责沙俄的侵略政策，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热情庆祝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对俄国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干涉。列宁谴责沙俄等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暴行，说：“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

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并说：“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 列宁更深切同情辛亥革命，反对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说：“鉴于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指辛亥革命)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代表会议② 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并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③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早期历史学者更严厉谴责沙俄对中国的侵略。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④ 苏联早期历史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1900年12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213—215页。

② 指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

③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1912年1月5日—17日[18—30]），《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457页。

④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7页，

学者在强烈谴责沙皇俄国对华掠夺政策的同时，还批判了沙皇政府御用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他们认为，早期沙俄殖民主义者侵占了中国的领土，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并正确地指出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与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等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苏联早期著名历史学家M. H. 波克罗夫斯基说："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不列颠的印度，它都不象在俄国的亚洲政策中以如此显著的特征，通过这么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并指出，穆拉维约夫在"征服"黑龙江地区时，使用武力威胁，"迫使对手离开并让出了他所要求的一切地方。"①

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苏联早期历史学者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谴责。该书说："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却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民众不愿意这次战争"(指日俄战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这次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堕落到护国主义，即主张保护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祖国'的立场上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却与此相反，认为沙皇政府在这次掠夺战争中失败是有益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而加强革命。"②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止的中俄关系史，主要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许多中苏之间的悬案，就是过去沙俄对中国侵略造成的。因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便成为中苏早期关系史的一个突出问题。

① M. H. 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1923年莫斯科出版，第321、356页。

② 见该书195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74—76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与北京政府参加武装干涉苏俄时期的关系中苏（1917年11月至1920年4月）

第一节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一、旅俄华工与俄国十月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侨居俄国的华人当在二十万以上。[①]。他们大部分是被俄国政府和资本家招募或诱骗去当苦力的。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俄国将大批工人、农民送往前线，后方劳动力极感缺乏，俄国政府为了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强迫中国北京政府同意招募华工。据《远东报》记载，自1916年至1917年从哈尔滨一地招募的赴俄华工就达五万余名。[②] 1916年秋，由长春义成公司买办周冕招募赴俄伐木的华工，一次便有两万名。[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旅俄华工，除直接从中国招募者外，另有英国招募去两河流域当战争苦力的华工，因不堪承受压

① 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6页。有研究者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俄华工总数至少当在四十五万人左右。（见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198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36—37页）自然其中一些人已陆续回国。

② 1917年6月1日《远东报》。见《地方史资料》第三辑。

③ 参阅1917年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

迫，逃往俄国高加索地区谋生者。①

旅俄华工大都来自中国北方城乡的贫民。他们在俄国铁路、矿山、森林采伐区以及一些城市工厂，从事十分艰苦的体力劳动。如摩尔曼斯克的一万华工，每人每天工资仅 1 卢布 50 戈比，而工作长达每天十二小时，假日也不得休息，居住在土窑和帐蓬里，没有医疗保障。② 此外，华工还遭受种种虐待，据 1917 年初中华旅俄联合会刘泽荣等人给北京政府的报告说：华工按约赴俄，但“俄人不遵合同，种种虐待，而包工头复种种剥削，苛细备至，甚有私募巡警，擅立刑讯，毒打工众，工人因此毙命者，所在皆有；因受潮湿，致成残废者，亦指不胜屈。”③

正因为旅俄华工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境地，便同俄国工人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俄国统治阶级的斗争。如“1917 年 5、6 月间，彼得格勒工厂经常爆发有组织的罢工，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反对克伦斯基政府的示威游行”。④ 十月革命期间，旅俄华工参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的赤卫队，并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⑤ 以及各地创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如彼得格勒造船厂的华工便是第一批加入赤卫队并参加攻打冬宫的战斗的。在明斯克地区森林采伐场工作的一千多名华工，有的参加了莫斯科赤卫队，有的被派往高加索同反革命作战。⑥一些华工战士还得到苏俄政府的极大信任，担任了列宁的卫士⑦ 据李富清回忆，十月革命后，七十多名华工战士和其它

① Г. 诺沃格鲁茨基等著：《中国战士同志》，第 20 页。
② 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第 8页。
③ 中华旅俄联合会呈，民国六年十月三十日。见《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至八年，1960年台湾出版，第 164 页。
④ 见《红旗飘飘》第四集，第 23 页。
⑤ 参阅《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1961 年莫斯科出版，第 11 — 12 页。
⑥ 见刘永安编：《鲜血凝成的友谊》 1959 年莫斯科出版，第 6 页。
⑦ 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第 11—12 页。

一百多名红军一起，被调到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士，他当时是卫士队的小组长，站岗的地点就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①

1918年初，即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的联合武装干涉与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白卫军的复辟活动。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旅俄华工积极参加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与消灭白卫军的国内战争。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只有彻底粉碎了列强的武装干涉，肃清了国内的白卫军，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才能获得巩固。这是更艰苦，时间更长的战斗。据估计，有四、五万旅俄华工参加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肃清白卫军的战斗，② 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18年2月，苏俄政府开始组建红军，有大批旅俄华工报名参加，这时“不但是个别的志愿者加入红军，而且是一批的支队，甚至是整团整团的部队完全从中国人中补充”，③ 出现了由华工战士组成的班、排、连、营、团，以及红色国际支队。这些部队的指挥员也大多是中国人。

1918年初在莫斯科建立的红军华人营营长孙富元说：“我的大多数战友原都曾在宾捷雷城的各工厂做工，因参加革命而失了业。资产阶级反对他们，于是他们就加入了赤卫队，起而反抗资产阶级，后来他们被编入红军。我们华人营就是这样建立的。”④ 1918年5月孙富元发出了《致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公开信，号召在俄国的革命的华人参加红军华人营，说：“革命的中国弟兄们！凡是为被奴役者求解放的人们，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吧！凡是

① 见《红旗飘飘》第4期，第53—73页。

② 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961年莫斯科版，第3页。又据1919年5月22日上海《申报》记载，有三、四万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

③ 刘永安编：《鲜血凝成的友谊》，第6页。

④ 《外国劳动人民与苏俄各族人民的战斗团结，1917—1922年》，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84—85页。

要保卫工农政权的人，请和我们一起前进吧！一切障碍和隔阂必将消除，获得解放的中国劳苦大众应当与全世界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①] 该营后来编入莫斯科混成旅第二十一团。

1918 年成立的苏俄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全团都是来自乌拉尔煤矿、石棉矿和铁路上的华工，团长叫郭来宾，搬运工人出身”[②]。另一个著名的国际团——乌拉尔中国团，团长是中国工人任辅臣，全团几千名战士，是 1915 年底来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华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矿区，华工们也都积极参加红军，如在顿巴斯矿区的高尔茨克矿井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华工“都志愿参加了乌克兰红军”，其余的华工“参加了护矿的赤卫队”[③]，哈尔科夫附近一个煤矿区的华工，在张川林的带动下参加红军，成立了一个中国连。

自 1919 年 1 月至 8 月，组成了八支新的中国国际部队，其中包括著名的中国模范团。这些由中国人组成的红军部队，分别加入东方战线的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南方战线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集团军，北方战线的第六、第七集团军，积极参加了粉碎协约国干涉军的历次进攻。[④] 在著名英雄夏伯阳领导的第二十五步兵师国际团中，也有不少华工。彼得格勒市第一区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彼得格勒华人国际支队”。[⑤] 其他还有苏联红军四六一团“中国营”[⑥] 等。

华工部队作战十分勇敢。战斗在南方战线的中国部队，出色地完成了粉碎白卫军的战斗任务，苏俄红军将领称赞他们“打起

① 见 1918 年 5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② 《红旗飘飘》第四集，第 42 页。
③ 《红旗飘飘》第四集，第 184 页。
④ 参阅《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1961 年莫斯科出版，第 25—26 页。
⑤ 《外国劳动人民与苏俄各族人民的战斗团结，1917—1922 年》，1957 年莫斯科出版，第 110 页。
⑥ 《红旗飘飘》第 4 期，第 143—144 页。

仗来象狮子一样，从不怕流血牺牲。’[①] 在粉碎英国支持的高加索白卫军叛乱的战斗中，中国部队表现了真正的英勇主义，受到苏俄红军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的嘉奖。[②]

旅俄华工将自己的命运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1919 年在莫戈契车站工作的华人公开声明：“我们将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无私地和俄国人民一起保卫苏维埃政权。’[③] 为了回答协约国列强关于红军华人部队是苏俄当局强迫组建的谎言，1919 年 11 月 25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华人红军战士大会，向全世界声明说：“华人红军战士是中国革命军队最初的核心，为帮助中国和整个东方工农，他们正与俄国的和其他的国际支队并肩前进。华人国际支队号召本队全体战友为无产者战胜资产者，为全世界革命胜利更加积极地建立一支支新的队伍，以回击协约国的无耻谰言。”[④]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的电报所说：“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同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并为此献出了保贵的生命。’[⑤]

苏俄政府对旅俄华工也十分关怀。俄国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即有中华旅俄联合会（Союз Киа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и)的组织，十月革命后，为适应旅俄华工情况变化的需要，又在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旅俄华工联合会（Союз Ки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В России))。1918 年 11 月 30 日，列宁接见了发起成立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中国南、北方工人代表刘绍周（即刘泽荣）、张玉川，他们

①《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第 19页，

②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北高加索革命战斗中的中国赤卫队》．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第 58—59页。

③《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 147—148 页。

④《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第 45—46 页。

⑤ 见 1977 年 11月 7 日《人民日报》。

向列宁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并表示中国人民将全力支持苏俄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作斗争。[①] 1918 年 12 月中旬，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正式成立，“有四至六万会员。会议决定越出工会的范围，使联合会具有进行广泛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性质。”[②] “联合会的任务是组织华人劳动者与俄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反革命和反对外国干涉的革命斗争。只有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工人可以成为会员。”联合会进行了大量文化教育和政治工作，开办政治学校、互助会、生产合作社、举行群众大会、音乐会、举办讲座，这些工作促进了对华工的革命教育。[③] 因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至莫斯科苏维埃的信说：“旅俄华工联合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该组织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出版中文的机关报——共产主义的《华工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进行宣传，与劳农政府携手合作”[④]。1918 年 12 月 15 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书，说：“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⑤] 1919 年 2 月 11 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的一次会议上致贺词说：“实现国际理想的时刻到了，不仅对于西方无产阶级，对于东方无产阶级也一样。中国工人应该向你们学习社会斗争的新方法，以吸取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东西。”[⑥] 1920 年 6 月 18 日至 24 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大会选举列宁和孙中山为大会名誉主席。6 月 23 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大会上发言指出与会者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

①《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第 41 页。
② 见 1918 年 12 月 15 日苏联《真理报》。
③见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59 年第 5 期，第 138 页。
④ H. A. 波波夫：《我们曾为苏维埃政权并肩战斗》，1959 年俄文版，第 29 页。
⑤ 见 1918 年 12 月 15 日苏联《真理报》。
⑥ 1919 年 2 月 12 日《消息报》。转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 年），第 13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应成为中国现有运动和未来运动之间的枢纽。①

旅俄华工联合会继续遣返华工回国的工作也得到了苏俄政府的支持。1919 年 5 月 15 日苏俄政府帮助拍发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执行部的一份电报说：“驻俄各使转达英、法、日本、中国、丹麦及北美政府鉴：华人在俄，既乏工作，又缺粮食，艰困万状。现已得广义政府（指苏俄政府）之准许，取道西比［伯］利亚回华……因此本会请求西比［伯］利亚及各联盟国政府，准许华工自由经过西比［伯］利亚及满洲里，直达中国。再本会……业经委托莫斯科华工会会长张永奎由彼与西比「伯」利亚或丹麦全权开始磋议。本会深盼各联盟国及西比［伯］利亚政府对于不幸之华工，必能与广义政府同表其殷勤慈善之意，前来相助。并盼立即用无线电答复。”② 对于苏俄政府的关心，第二天刘绍周代表旅俄华工致电列宁表示感谢，说：中国同志非常珍惜“中央当局对中国公民的关切态度”，并向列宁保证，“旅俄华人定将全力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③ 1919 年 11 月 21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秘书叶努基泽还为刘绍周签发证明书：“此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各机关及主管部门全力协助旅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刘绍周及其所代表的全权人士处理关于组织旅俄华工和顺利地如期将其从俄国中部东遣至中国国境”。④

返回祖国的旅俄华工，许多人受过俄国革命的洗礼。因此，中国北京政府千方百计对他们的活动加以监视。

① 见 1920 年 6 月 30 日苏联《真理报》。

② 收驻俄使馆郑［延禧］秘书函，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五月十五日发），见《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六至八年，第 509 页。

③ 转引见 H. A. 波波夫：《我们曾为苏维埃政权并肩战斗》，第 30 页。

④ 转引自李玉贞：《10 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第 25 页。

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述了俄国进步思想界寻找革命真理的艰难过程，他说：“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①] 从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向西方寻找革命真理，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希望在中国建设起西方或后来日本那样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强国，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绝望之中。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他们看见了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②]俄国革命的胜利，给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1917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民国日报》与《申报》都报导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政变”为题报导说：“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军工代表会开特别会议，列宁“提出俄国民治三大问题：（一）即行结束战局，新政府必须向交战国提议休战；（二）以土地给还农民；（三）解决经济困难。听者大为欢呼。全会继乃通过决议案，主张从速解决此数问题。”关于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1918 年 2 月 15 日的上海《申报》也作了报导，说：苏俄政府“公布公文声明，凡以

① 见《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82 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96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1407 页。

前之政府所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限于一千九百十八年一月末以后概行作废。”作为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1918年的元旦社论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切希望，并指出：“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同人权，同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同建设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之民主国家，使国内之各民族各阶级举为平等，而个人之法律上人格皆为尊重。换言之，求人权及民权之伸张也，求平等自由精神之实现也，求吾国之永久和平也。”

大约在1918年初夏，当协约国正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中国伟大的民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便代表中国南方国会和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通过美洲的华侨自上海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胜利，电文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① 列宁收到孙中山的贺电非常感动，因为这是第一个贺电，列宁将此视为“东方的曙光”。孙中山还说：“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②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复函孙中山，表达了从中国获得革命支援的愿望，说：“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俄国资产阶级，象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在这个

①见《政治周报》第5期第11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

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①] 可惜，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这封信[②]。但孙中山仍设法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关注苏俄形势的发展。

与此同时，1918 年 5 月 27 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文指出：“俄国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而已。至属地问题，则亦以放任主义之反前专制政府压迫政策，务使人民悉登乐土。对于邻邦，则深不满意于日本之侵略政策，……于可见民主政策，决无侵略主义参杂于其间。……二十世纪之潮流，已渐趋向于民主，故段氏（指段琪瑞）以十倍之兵力，数倍之饷械，不能战胜南方，而日本国民亦不满意其政府专断之行为，群表同情于我民党，其民治思想之发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势。而俄国数千年之专制政策，亦为提倡和平之列宁政府所推翻。行见东亚大陆将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并强霸之主义，决难实见于今日矣。”[③] 这里所说“放任主义”，即指民族自决权。文章称颂了苏俄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表明中国革命者已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

据何香凝的回忆，当时孙中山曾打算派亲密战友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前往苏俄考察，并责成他们从速学习俄语。当时廖仲恺家里还请了一名俄语教员。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④] 1919 年 7 月 25 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利权。同年 9 月，戴季陶虽在《星期评论》上报导了这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 1 卷，第 415—416 页。
②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第 434 页。
③见该日报第 3 版。
④见何香凝：《我的回忆》，见《人民日报》 1961 年 10 月 6 日。

一消息①，但“宣言”正式递交中国北京政府并在中国报刊上全文刊载，则是1920年3、4月间的事；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以“劳农政府通牒原文”的标题，全文登载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4月14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全版编为“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专号。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发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现在不知道孙中山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言论，但当时还是孙中山追随者的陈炯明为此曾致函列宁，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欢迎和感谢。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与苏俄的巩固，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列强的干涉下屡遭失败，使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向往苏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绝境，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成长并壮大起来，给中国革命准备了新的力量，使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批急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迅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李大钊满腔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内，李大钊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论文。第一篇是7月1日发表于《言治》季刊第三册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说明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及其意义，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

①见《星期评论》第十五号。

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同年11月、12月间，李大钊又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说：“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 李大钊于1919年1月5日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号上的“新纪元”一文，更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说：“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如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革命者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确实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的革命者，一部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找到了马克斯列宁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以后经过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便诞生了。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另一部分革命者，以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先进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也从俄国革命的成功，见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并接受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喊出了“以俄为师”的伟大声音，从此中国革命便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向前发展了。关于这一段中苏关系的历史，我们在后面将要详细地加以叙述。

①见《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